

致公党的民主建国之路

□ 孙 信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为主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致公党历史悠久，于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成立，是创建时间最早的民主党派。长期以来，致公党为维护华侨合法权益、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建设民主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党为党 参与国内政治活动

致公党的前身为美洲洪门致公堂，源于洪门组织。洪门最初为反清复明的民间秘密组织，在组织发动多次起义失败后，洪门人士纷纷逃亡海外，组建具有“华人共济会”性质的群众团体，洪门组织由此在美洲、澳洲和南洋等地发展起来。美洲致公堂就是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雄厚的一支。

为在华侨中发展革命力量，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随即以任职洪棍为契机，整顿改组致公堂，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致公党的宗旨，使致公堂由一个民间互助组织转变为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组织，积极参加国内革命斗争。武昌首义前后，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一处就提供了20余万美金，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致公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3年10月10日，黄三德、司徒美堂等洪门团体的代表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草案》，为致公党的成立作了准备。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大会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选举陈炯明为总理，总部设在香港。这次恳亲大会即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致公党的成立。

为加强党务工作，解决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问题，1931年10

月，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美洲洪门元老司徒美堂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从而在组织上脱离秘密会党的组织形式，转变为现代政党。大会还通过了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

解囊救难 投身抗日救亡斗争

1932年，美洲华侨洪门人士得知马占山江桥抗战和十九路军上海抗战的消息后，立即募集大量资金，请国民政府转交抗战将士。1933年11月，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致电拥护，表示：致公党与广大华侨，愿为新政权效力。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致公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内，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与致公党等各党派、各团体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后，官文森与戴子良等人联合发动马来亚惠州华侨组织“惠州救乡会”，积极募集人力、物力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响应共产党号召，出资组织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回东江参加抗日救国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司徒美堂于1月8日分别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发出电文，反对“枪口对内”“投降分裂”的可耻行为。毛泽东复电指出，中共始终以民族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合作抗日到底。这表明中共与致公党完全一致的政治立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但海外致公党组织仍然同所在国人民一起以各种方式抗击日本侵略者。

司徒美堂说，“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可痛，要雪耻就需先捐钱”。为了集中全力开展侨胞募捐活动，司徒美堂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工作。据估计，抗战期间，纽约华侨每人平均捐款1000美元左右，共计1400万美元，全美洲华侨捐款约几亿美

元，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反对独裁内战 主张民主和平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美洲各地致公党的报刊与其他爱国华侨的报刊就联合发表了《十报宣言》，明确提出“中国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并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与此同时，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开始着手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筹备工作。1946年7月，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表《致公党组织概况》一文，重申该党“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主张“军队国家化；尤主张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以和平方式协商，求得政治合理的解决”。《致公党组织概况》的发表，标志致公党恢复活动。

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致公党政纲》《中国致公党章程》，《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电文》，并正式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任秘书长。

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全面阐述了致公党的政治主张和任务要求。《中国致公党政纲》规定：致公党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为奋斗目标。在侨务上主张设立侨务机构，保护侨胞的权益，鼓励侨胞投资，加强侨胞与祖国的联系，等等。《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今日中国国家民族存在的严重危机，完全由国民党的独裁内在政策所造成。解决国是问题的程序为：停止内战；重新召开各党各派的政治协商会议；由政协会议产生各党派平等联合政府，以代替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三党政府；由联合政府筹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规定，选举产生真正民主的政府。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地完成了恢复和改组的任务，标志着中国致公

党由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沈钧儒、何香凝以及郭沫若等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6月9日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新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号召华侨同胞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1948年10月18日，司徒美堂在香港发表《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1949年1月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司徒美堂，请他莅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因留守香港未能出席）、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参加会议。司徒美堂作为华侨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指出，“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至此，致公党走上了建设新中国的新的历史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会议上，致公党以党派名义递交了一份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成为党派第一提案。

民主党派与民主建国道路

略布局之中。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各方面工作有了明确定调和全面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时代变化和实践要求，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一系列新判断和新观点，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时代。

时代孕育着机遇，历史预示着未来。新中国70年法治发展是一个承前启后、与时俱进、整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推向前进，不断为社会主义法治注入中国元素与时代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一篇不断被续写的大文章，是法治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形式，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主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在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不仅对于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法治文明史上也都具有跨越时空的意义。中国法治一路走来，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进入新时代，中国法治的使命艰巨、重任在前。我们将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不断开创中国法治的新征程与新境界。

宦官登上东汉的政治舞台，并且发挥作用，与太后临朝有关。女主执政，不能与士人相接，必须通过宦官沟通内外。宦官参政，正和汉顺帝即位密不可分。他们如何立功而成为“顺帝功臣”，乃是探索宦官参政的最初线索。

汉顺帝的即位。汉顺帝刘保的即位之路颇不顺利。刘保是汉安帝所立太子，因为对父亲的乳母等人干政不满，被群小构陷而废为济阴王。不及一年，汉安帝驾崩，皇后阎氏临朝，立汉章帝曾孙北乡侯刘懿为皇帝。无奈这个小皇帝在位刚过半年就驾崩了，阎后又与诸外戚谋立其他诸侯王子。无论是北乡侯也好，其他诸侯王子也罢，毕竟都不是汉安帝的嫡子，他们都不如被废黜的刘保血统纯正。

皇位空虚，外戚干政，怎么看都是政治上的危机时刻，正需要有人站出来为汉朝登高一呼——孙程站出来了，尽管他只是个宦官。

北乡侯病笃时，孙程私下联系刘保的谒者长兴梁，陈说刘保应当即位的道理。得到长兴梁等人的支持后，孙程又联系诸多与刘保有旧的宦官。北乡侯薨时，孙程联络宦官十八人，斩杀内廷中太后阎氏的私人，立刘保为帝，是为汉顺帝。

孙程等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因为这次活动就发生在宫省之内，是由内而外的一次大起事。宦官是宫省宿卫中最核心的力量，这支武装的向背，直接关系皇帝的安全。

因此大功，孙程等诸人均被封为侯，也就是前文说的《东观汉记》称他们为“顺帝功臣”的由来。孙程等人除拥立顺帝以外，几乎不曾过问政事。但是顺帝得宦官之助，也看到了宦官对皇位的影响，他开始信任宦官——东汉政治中宦官所占的权重日益增加了。

汉末中常侍。汉顺帝最宠幸的宦官是曹腾。曹腾在顺帝朝由小黄门迁中常侍。小黄门是低阶宦官，而中常侍秩比二千石，相当于朝堂上的高级官员，是皇帝身边宦官能担任的最高官职。《续汉书·百官志》载其职责是“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也就是管理皇帝日常起居的职务。

曹腾在汉宫中服役30余年，经历顺、冲、质、桓四位皇帝。据说他为人谨慎，从未有过，而且能不计前嫌，进达名士，度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堂谿典等人全都是曹腾举荐的。不过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曹腾只不过是内宫中的官员，根本没机会与外官交接，他是如何了解不同人的情况，并向皇帝进言的呢？如果深究起来，其中自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秘。

举荐大臣尚不能让曹腾知足，他还要干预皇帝的选立。

汉顺帝驾崩后，大将军梁冀辅政，先后立冲帝、质帝，二人均不克终。朝中大臣如李固等人的意见是拥立长君，属意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梁冀正犹豫不定之际，曹腾等中常侍连夜游说梁冀，所谓“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举。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

汉桓帝虽然得梁冀拥立而为天子，内心实则对梁冀非常忌惮。特别是梁冀骄横日甚，汉桓帝内心不平，与小黄门史唐衡谋划，联络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小黄门史左悺谋划诛除梁冀。当日汉桓帝啗单超臂出血为盟，以诸常侍之力收梁冀及其宗亲党羽。左悺、唐衡由此迁为中常侍，立功的五名中常侍同日封为诸侯，号为“五侯”。汉桓帝又封小黄门刘普等人乡侯，自此权归宦官，朝政日乱。

单超病逝之后，其余四名中常侍日益骄横，民间编出谚语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他们不但竞起第宅、仆从竞路，还安排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

在地方上诸常侍的私人亲党如此跋扈，激起了士人和外戚的不满。他们在朝堂上挺身而出，与宦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宦官、外戚、士人的斗争。汉桓帝信任的宦官有一名叫侯览者，他的兄长、亲属在地方上为非作歹。侯览故乡山阳郡的督邮张俭将他家乡的宅舍财产通通抄没。侯览反而借机诬要张俭在结党乱国，建议汉桓帝抓捕、禁锢所谓党人，由此掀起了第一次的党锢之祸。

张俭亡命天涯，“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据说他所经历之处，“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可是这么多人为什么宁可牺牲性命也要保护张俭呢？他们要保的，不单单是张俭这个人，

东汉的宦官参政

□ 曲柄睿

更是士大夫的清正意气，更是士人对社稷百姓的拳拳之心。当东汉朝廷向士大夫群体举起屠刀时，它斩断的实际上是自己的根基。

曹节是汉桓帝后期信任的中常侍。桓帝驾崩时，曹节曾前往迎立汉灵帝即位，因此功劳，深受灵帝信赖。可朝政在曹节等人的干扰下更加混乱。此时，窦太后临朝，皇后父亲大将军窦武执政，与太傅陈蕃谋划诛杀宦官集团，试图一改汉朝宦官参政导致的颓势。宦官、外戚、士人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并由政治斗争转化为军事冲突。

陈蕃是东汉有名的士人。他10岁那年，有父亲的朋友来他所处室做客，发现庭宇污秽，问他为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蕃回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年少如此便有清世之志，为客所奇。后来汉桓帝时，陈蕃任太尉。宦官诬杀大臣，干乱朝政，陈蕃向皇帝斥责他们“妄相交构”，建议“斥黜佞邪”。引发宦官集团的不满，不过是因为陈蕃名气太大，尚不敢加害。汉桓帝也觉得陈蕃有些麻烦，将他免官。

不过桓帝驾崩时，窦太后临朝，又重新任命陈蕃为太傅，并赋予他录尚书事的权力。至此陈蕃与大将军窦武掌握了汉朝廷的最高权力，他们同心尽力，征用名贤，引得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后汉书·窦武传》说“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意思就更为直白了。

陈蕃、窦武计划铲除宦官，无奈窦太后犹豫不决，导致机谋泄露。曹节等人听说谋杀宦官的消息，胁迫汉灵帝为质，发动宿卫兵力劫持太后、关闭宫门，与窦武和陈蕃对抗。

窦武毕竟是将军，得知宦官矫诏来捉拿自己，驰马入步兵校尉营，以此为基础召会北军五校将士数千人集合，宣布宦官造反，尽力捕杀者封侯。宦官与外戚、士人的矛盾，以军事政变的形式达到了顶点。

窦武所统将士与宦官控制的宫廷宿卫军交汇于宫城之外。宦官对北军五校一直颇有威望，阵前一番对峙喝骂，五校之士气势尽泄，逐渐投降散尽。窦武被困宫门，陈蕃也被宦官害死。

陈蕃、窦武与宦官集团的军事冲突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标志着东汉的士人和外戚集团开始了某种程度的联合。士人不再期待于皇权能够给他们公道，他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谋求正义，建立起澄清的政治新秩序。东汉的政治，进入了一个混乱的阶段。

范曄在《后汉书·宦者列传》对比西汉、东汉的灭亡指出，“西京自外戚失势，东都缘阉仆倾国。”他将宦官参政，看作东汉灭亡的最主要原因。宦官虽然生理上有残缺，但在政治上很得意。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将自身的荣宠富贵，建筑在对整个国家百姓的剥削与榨取之上。

宦官的祸国举动，与外戚的干政一道，对汉政权最大的伤害是打击了士大夫的信心。当此汉之纲纪大乱之际，虽然仍有李固、陈蕃之流愿意挺身而出，但更多的士人，也愈加丧失了为汉奉献的意气。而后随着黄巾大起义的到来，士大夫的分化愈加明显，东汉的统治也由此风雨飘摇。

两汉风云